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疫活动

——以常德细菌战防治为例

季驰炜　徐志民

〔摘要〕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依照大本营陆军部指令，对湖南常德实施了细菌武器袭击。该次袭击引发了常德地区1941年底与1942年初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常德周边李家湾、石工桥、镇德桥等地受到波及，大量平民伤亡。疫情发生后，国民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先后派遣陈文贵、伯力士等医疗专家指导常德防疫事宜。常德防疫工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扩散，虽有不足之处，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常德相关防疫措施一方面吸取了浙江防疫战的教训，另一方面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工作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常德细菌战；鼠疫；防疫；陈文贵；伯力士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6)01－0189－10

1941年11月4日，作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粮棉基地和交通枢纽的湖南常德，受到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暴发了前所未有的鼠疫。根据国民政府的防疫部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着手研究常德地区鼠疫问题，并成立常设机构开展实地调研与证据收集工作，以加强疫情防治和揭露侵华日军的反人道罪行。常德地区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逐步构建起联合防疫体系，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广泛开展防治工作，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工作的样本。近年来，常德细菌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①，但对国民政府的防疫行动评价不一，存在争议。笔者通过梳理国民政府在常德细菌战中的两次防疫工作及其成效，结合全民族抗战时期各地不同的防疫措施与经验，揭批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派学者否认战时日军细菌战的谎

〔作者简介〕季驰炜（1995—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徐志民（197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248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项目“近代日本攫取中国东北矿藏资源史料整理与研究（1905—1945）”（24VLS020）

① 相关代表性成果有，陈致远、郑军：《伯力士反日军常德细菌战的杰出工作及贡献（1941.12—1943.3）》，《武陵学刊》2024年第3期；王向清、雷定京：《民国时期邓一韪防控常德地区鼠疫的经验及其启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张华：《伯力士在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后的防疫工作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陈致远：《常德细菌战若干问题新探》，《武陵学刊》2017年第1期；朱清如：《1941—1942年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检讨》，《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李雪：《日军荣字1644部队在华中地区的三次细菌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22年；文贤弈：《常德细菌战的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20年；朱清如：《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聂莉莉：《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刘云、金菁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言，客观认识常德细菌战防治在国民政府战时防疫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一、常德细菌战的认定

常德位于湖南省北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连接抗日前线与大后方的重要城市，也是国民政府第六战区诸多部队的驻地。①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而常德在抗战期间不断受到日军的轰炸。②常德地区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其日记中写道，日本侵华战争对常德的第一直接影响来自天空，日军从1938年11月开始空袭常德，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③在长达四年半的轰炸中，除了投掷常规炸弹与燃烧弹外，日军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侵华日军对常德进行细菌武器袭击的记录始于1941年。据鼠疫专家、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验医学指导员陈文贵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晨五时许，敌机一架于雾中在常德上空低飞，掷下谷麦、絮纸、毡棉及其他不明之颗粒状物多种，分落鸡鸭（鹅）巷、关庙街及东门一带。迨午后五时，警报解除，始由军警搜集散下物一并焚毁，且留送一部分交广德医院用显微镜检验，其染片结果，凡在常德之医务人员均认为类似鼠疫杆菌。"④时任常德防疫处副处长邓一韪也说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六）早上六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有巨型日寇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警报解除后，市民将这些东西扫集拢来，共约四五百斤，除由警察局取了一点存于玻璃瓶以备检验外，余尽焚毁。"⑤关于日军空投异物的记载，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在其《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中也有记录："（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上午五时许，敌机一架，于大雾弥漫中在常德东城市上空低飞三匝，投下谷麦、絮棉及其他不明颗粒状物，多坠落于城内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敌机投掷异物时，常德居民目击其状者甚多，其中并有美籍传教士巴牧师及其夫人可资佐证。当地卫生医务人员惊讶之余，忽忆及暴敌曾于二十九年冬在浙江鄞、衢两县，用飞机投掷同样异物，因而引起鼠疫之发生。"⑥日军空投异物的行为引起了常德地方政府及医疗防疫部门的警惕。1940年日军曾对浙江衢州、宁波等地空投异物，导致这些地区鼠疫流行，为此国民政府于1940年12月5日颁布了《防制敌机散播鼠疫菌实施方案》。⑦前车之鉴提高了常德地方政府及医疗防疫部门的防范意识，使其在发现异物后积极开展化验检查工作。

日军于常德投掷之异物，经多次检验可以确认是携带鼠疫菌的细菌武器，亦是引发常德鼠疫流行的罪魁祸首。由于对日军投掷异物的行为早有防范，11月4日发现日军飞机投下异物，常德军警在警报解除后，组织民众将异物聚拢焚烧，并留存一小部分快速送往本地广德医院进行化验。时任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医生，与检验师汪正宇立即对异物进行化验。二人"以谷麦少许，浸洗无菌生理盐水中，十五分钟后，以离心器得沉淀质。将沉淀质作涂抹片，经革兰氏染法，在浸油显微镜下检查，除大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并有少数两极着色杆菌——疑似鼠疫杆菌。第二步宜作细菌培养。惟该院限于经费，尚无此种设备。谭医师乃自一肝硬化患者取出腹水三十公撮，分装于三个无菌试管内。以二试管培养敌机所投下之谷麦，而其余一试管培养自一粮商处所取来之谷麦，以资对照。此三管均置于温箱内，经二十四时，取出检视，见含有粮商处取来谷麦之试管，其液较清；而其他含有敌机投掷谷麦之试管其液较

---

①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555—576页。

② 常德市志编纂委员会：《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0—21页。

③ Phyllis Bannan Woodworth, *From Manchu to Mao: At Home in Hunan, 1909-1951*, Portland, Oregon: Printer's Inc., 2009, pp. 305-312.

④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372—2—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邓一韪：《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页。

⑥ 容启荣于1942年5月奉命前往常德调查鼠疫并指导防疫，9月完成《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该报告现藏于湖南省档案馆，74—3—6。

⑦《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浊。取此浊液作涂抹片，用革兰氏染法，除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又有两极着色之杆菌，用测量镜量其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米，对照培养液内则无此种细菌。”①汪正宇认为，鼠疫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适合用作细菌武器；日机投掷的谷、麦等物均为鼠类食物；常德本地鼠类众多，适合散布鼠疫；日军于1940年在浙江衢州等地散布过鼠疫菌。②结合化验结果，二人认定日军该次空投异物是对常德发动的细菌武器袭击。

常德鼠疫暴发后，国民政府派遣鼠疫专家陈文贵组建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携带检验器材、疫苗及治疗鼠疫特效药，于1941年11月24日抵达常德。陈文贵团队到达常德时，正值患者龚操胜发病致死，“即经举行尸体解剖、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等实验，由各种检查之结果，均证实为真正腺鼠疫无疑。”③由此，陈文贵确认常德鼠疫开始流行，之后就常德鼠疫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与验证。

常德鼠疫流行是否源自11月4日日机投掷异物？陈文贵的检验结果和分析结论是肯定的。他指出鼠疫流行的可能起因共有三种：一是本地起源，即敌机投掷异物前常德已有鼠疫流行；二是国内临近疫区将鼠疫传播至常德；三是日机投掷异物引发常德鼠疫流行。针对以上三种可能的起因，陈文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首先，翻阅资料可知，常德长期以来并非鼠疫疫区，在全球鼠疫大流行期间湘北地区也未受到感染；自发出现鼠疫之事，更是前所未闻，故鼠疫本地起源说不太可能。其次，根据传染病学原理，鼠疫传播依赖粮食运输线的延长，常德距最近的疫区浙江衢县2000公里有余，按当时国内交通状况，跨区域传播实无可能，故常德疫情并非国内相邻疫区传播而来。由此可见，常德鼠疫缘起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机的投掷异物中含有鼠疫病原。陈文贵提出两大理由，其一，常德鼠疫暴发初期的所有病患皆来自日机投掷谷、麦最多的区域；其二，常德患者的发病时间为日机投掷异物后七日左右，而普通人类鼠疫流行需要两星期之久，鼠类之间互相传播亦需要两星期之久，短短七日内出现人类鼠疫流行，绝非自然鼠疫暴发所能导致。④

奥地利犹太人鼠疫专家、时任卫生署防疫专员伯力士⑤，从1941年12月在常德主持防疫工作。12月30日，伯力士向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金宝善提交了《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其关于常德鼠疫起源的看法，与陈文贵不谋而合。伯力士认为湖南之前未有鼠疫流行的记录，缺乏鼠疫发生的条件。浙江东部和江西南部距离常德最近的鼠疫感染地区，患者至少也需10天才能从疫区到达常德，3天至7天的潜伏期意味着患者在抵达前就应当出现症状。关于日军投掷的杂物上并未检测到鼠疫菌这一现象，伯力士解释道，鼠疫菌在非生物体上难以存活，谷物和麦类也不太可能成为鼠疫传播的媒介，常德鼠疫很可能是通过飞机投放携带病原体的跳蚤传播的，这在细菌战中是一种更理想的策略。棉花和碎布可能被用来保护跳蚤，部分跳蚤咬人后可能导致鼠疫传播，而另一部分则可能寄生在老鼠身上，未来可能引发鼠间鼠疫，进而再次引发人间鼠疫，这一现象值得持续监测。⑥伯力士认为鼠疫后期会卷土重来这一判断在日后得到了证实。常德鼠疫暴发是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导致的这一观点，并非国民政府的一面之词，在近年来曝光的日方史料中也得到印证。

随着日本细菌战相关档案资料不断被发现和整理，日军对常德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也得到证明。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原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雄男的《井本日志》。井本负责日本细菌战的联络工作，他在前述“日志”中记载了1941年8月增田知贞向参谋本部请求实施细菌战，参谋本部于9月16日下达同意实施细菌战的指令。⑦11月25

---

① 谭学华：《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1942年3月1日，67—1—333，湖南省档案馆藏。

② 汪正宇：《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1942年12月，转引自邢祁、陈大雅主编：《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70—73页。

③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372—2—16。

④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372—2—16。

⑤ 伯力士（Robert Pollitzer），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1921年至1930年曾参加伍连德领导的“东北防疫总处”防治鼠疫等工作，1931年至1937年又随伍连德到上海参加中国海关检疫工作。

⑥ 伯力士：《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1941年12月30日，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0—214页。

⑦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731部隊の実相に迫る 日本軍の細菌戦——明らかになった陸軍総がかりの実相』、『戦争責任研究季刊』第2号（1993年冬季号）、14頁。

日，井本在“日志”中写道：“接到11月4日目的地方向的天气情况良好的报告，一架97轻型飞机出发……5点30分起飞，6点50到达，雾浓，放低高度进行搜索，因海拔800米附近有云层，在1000米以下实施……谷子36公斤①，其后岛村参谋进行搜索……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11月20日前后从鼠疫凶猛流行的各战区收集卫生材料，判定‘如果命中确实会发病’”。②该记载虽与中国史料所载略有出入③，据伯力士的报告，常德鼠疫流行始于11月12日④，但可以确认日军在常德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井本日志》还记录了日军对常德细菌战战果的评价：12月2日，日军宫野大佐报告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鼠疫极为猖獗；12月22日，增田少佐称“石井部队”（即第731部队）士气高昂，对“谷子”的信心大增，并计划于1942年6月后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作战，希望获得30万只小白鼠用作生产细菌。⑤可见，日军对常德细菌战袭击的战果颇为满意，并将其视作细菌战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为此，日军细菌战部队中的研究人员，也对常德细菌战战果进行了细致评估和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正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罪行的有力证据。

在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中，《金子顺一论文集》证实了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反人道罪行。该“论文集”中的《PX效果略算法》为整部论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题目中的“P”与“X”分别指代“鼠疫”和“跳蚤”，合在一起是“感染鼠疫的跳蚤”，即前文《井本日志》中提及的“谷子”。在《PX效果略算法》中，有对第731部队6次细菌作战成果的统计表，分别记录了袭击时间、地点、使用鼠疫跳蚤数量、死亡人数等信息。在该统计表中，记录了昭和16年（1941年）11月4日的细菌作战，袭击地点为常德，使用1.6 kg鼠疫跳蚤，先后造成2810人死亡的“战果”。⑥这一记载与《井本日志》中关于常德细菌战时间、使用武器等记载相吻合，再次证实了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罪行，同时验证了伯力士对日军以鼠疫跳蚤为细菌战武器的推测。

通过中日史料互证，可以确定在1941年11月4日，日军派遣飞机投掷了1.6 kg的鼠疫跳蚤和其他杂物，导致常德地区暴发鼠疫，造成了大量无辜民众伤亡。这次细菌战袭击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而且造成区域自然环境的污染。面对日军反人类的细菌战袭击，中国军民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在医疗技术落后、防疫物资短缺的困境中，坚持防疫治理，开展自救工作。

二、国民政府的紧急防疫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由于长期战争和科技、经济、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医疗与防疫力量严重不足。据统计，1940年，中国的卫生防疫人员仅有1217人⑦，且这些人员分散在政府、军队等不同机构，无法统一指挥。政府防疫方面，国民政府卫生署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浙江、江西、福建、云南等地共建立了11支防疫大队、25支防疫中队和11所防疫医院，以便疫情发生时就近支援。⑧军队方面，

---

① 所谓“谷子”，即感染鼠疫的跳蚤。

②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731部隊の実相に迫る 日本軍の細菌戦——明らかになった陸軍総がかりの実相』、14頁。

③ 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常德细菌战首位确诊感染者蔡桃儿于11月11日发病，12日前往广德医院确诊。《井本日志》载11月6日常德鼠疫即开始流行，与前述时间不合。据广德医院谭学华、汪正宇回忆，11月8日常德首次防疫会议后，曾出现居民死于急症的传闻。由于这段时间内常德县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检疫措施，且当地民众卫生观念淡薄，鼠疫是否早于12日前就已经暴发这一问题，尚无直接的中国史料。《井本日志》记载11月20日常德鼠疫流行越发凶猛，可为印证。

④ 伯力士：《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1941年12月30日，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第210—214页。

⑤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731部隊の実相に迫る 日本軍の細菌戦——明らかになった陸軍総がかりの実相』、15頁。

⑥ 金子顺一，1913年生，日本陆军军医少佐，曾隶属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1949年，金子顺一将其于1940年6月至1944年7月间撰写的8篇细菌战研究论文整理成《金子顺一论文集》，提交于东京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金子順一「PXノ効果略算法」、转引自奈須重雄「秘密資料・〈金子順一論文集（昭和19年）〉の発見とその意義について」，NPO法人・731部隊細菌戦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anti731saikinsen.net、2025年6月3日。

⑦《防疫人员统计表》，1940年12月，《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

⑧《医疗防疫总队十周年纪念刊》，372—2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医处连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于1941年组建了9支防疫大队，用以支援各地疫情防控。①此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下辖的10支救护大队，亦随时待命。②为集中全国卫生防疫力量，国民政府卫生署于1940年5月召开了全国防疫会议。③1940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统筹全国防疫工作，其人员由卫生署、军政部、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及红十字总会等多方抽调而来。这一机构是当时国内战时防疫的领导机构，也是全国疫情情报中心。④会议根据《疫情报告办法》，明确了疫情报告的分类机制，即依据疫情严重程度，分为电报报告和旬报报告两种形式。报告格式规范明确，确保报告内容简洁明了。公文流转分四级上报体系：初站、中站、基站及总站。基站包括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及后方勤务部卫生处等部门，主要负责汇总并上报初站和中站的疫情信息。总站作为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收集和整合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报告。⑤国民政府的防疫体系、防疫力量虽然总体上薄弱，但是湖南作为直面日军第一线的战场省份，其防疫力量与其他地区相比则较为充实。

1939年后，国民政府将不少防疫力量部署在湖南。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兵分多路进攻长沙，拉开了长沙会战的序幕。⑥湖南成为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主要省份，同时是守卫重庆的重要防线。因此，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在湖南配属了252名防疫人员，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当时各省部署防疫人员唯一超过200名的，足见国民政府对湖南防疫工作的重视。⑦湖南各地还兴建了15所隔离医院、14个检疫所，各县均设立了卫生院及卫生事务所。常德的官方医疗机构虽有卫生院，但设施极为简陋，只设有门诊部，没有能力安排病人住院治疗。常德还有一所私立的广德医院，与县卫生院相比，医疗条件较好，设有100张病床，由美国教会于1898年创立。⑧1941年，广德医院主要负责人为美国长老会牧师巴天民和中国医师谭学华，医护人员以中国人为主。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有一支以钱保康为队长的第2中队驻扎常德，其下辖的5支小队分别驻扎常德其他地区。⑩可见，常德的医疗队伍相对完整，具有一定的防疫能力，虽然无法完全消弭日军细菌战袭击带来的灾难，但在遭受细菌战袭击后能够完成基本的防疫应对工作。

面对日军的细菌战袭击，常德的医疗体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应对。遭受细菌武器袭击前，常德县政府于1941年2月通令全县，注意防范“敌机在金华散放鼠疫杆菌”⑪，并在之后的数月间积极推动防御鼠疫相关事宜。⑫日机在常德投掷棉花、谷物等异物的当日，据钱保康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1941）十一月份工作报告》记载，“警报解除后，由常德县警察局及镇公所将敌机所散布之谷麦等收集稍许，送至广德医院。经该院谭学华及检验室技士（检验）……据谭医师声称，将送来谷麦等以无菌之生理食盐水浸洗，经15分钟以沉淀器沉淀作涂抹标本，以革兰氏染色镜检，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及少数两极染色（类似鼠疫）杆菌”。⑬由此可见，在日机空投异物后，常德县警察局相关人员并未第一时间搜集散布异物，而是等到警报解除后才开始，这一行为直接导致所收集的异物中未

---

①《军政部防疫部队配备表（1940—1941年）》，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第280—282页。

②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第71—73页。

③《陈万里、刘经邦、柯主光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报告》，1940年12月，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补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2—123页。

④ 容启荣：《抗战六年来全国防疫工作概览·战时防疫机构之设置》，372—1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专载：疫情报告办法》，《浙江省政府公报》第3233期，1940年7月11日，第36—40页。

⑥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中国事変陸軍作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83年、378頁。

⑦《各省防疫机构一览表》，1940年12月，《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

⑧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372—2—16。

⑨ Phyllis Bannan Woodworth, *From Manchu to Mao: At Home in Hunan, 1909-1951*, pp. 312-315.

⑩ 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贵阳市档案馆藏。

⑪《常德县警察局第十五次局务会议》，1941年2月13日，100-3-171，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⑫《常德县政府防御鼠疫组织卫生运动通知》，1941年4月24日，100-3-224，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⑬ 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

能检测出带菌跳蚤。与常德警察收拢异物之行为不“及时”相比，广德医院收到日机投掷异物后立即进行了化验。

在遭受细菌武器袭击初期，检疫病毒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浙江防疫战中，由于细菌战爆发突然，浙江当地政府及防疫机构未能及时收集、检验及保存证物，从而失去揭露日军罪责之机会。①谭学华及时化验常德警察收集的日机投掷谷、麦等异物，检验结果即使在今天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尊重和认可。②2000年，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中村明子，在《中国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中，认为谭学华进行的涂抹标本检查是规范且客观的；细菌培养检查设备虽然不完备，但其设置对照组的措施体现了充分的客观性，其检查结果是完全站得住脚的。③谭学华等人的化验不仅认定了当时日军投放的细菌武器，而且为后期防疫活动提供了正确的应对方向。“十一月五日（上午），常德各有关机关召开防疫座谈会。谭学华医师代表广德医院出席，提议以下各事：（一）敌机所投之谷麦，除收留小部分严密封存，留待专家检验外，其余一律清扫焚灭；（二）急电省卫生处，请派专门人员，来常德检验以便证实及协助防疫；（三）扩大鼠疫宣传；（四）速设隔离（医院）所。”④

常德县相关机构在日军投放细菌武器后的第二日便召开防疫会议，反应较为迅速，这与国民政府在浙江细菌战中积累的防疫经验密不可分。根据浙江防疫调查工作报告，国民政府在1940年12月发布了《防制敌机散播鼠疫菌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日军可能使用细菌武器，要求各省积极培养应对细菌武器的医疗技术人员，制定防制日军散布细菌武器的应对预案。⑤该《方案》公布后，常德县政府即通令县内各机构知晓，故相关机构能较快意识到日军飞机投掷异物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快速召开防疫会议。然而，国民政府地方行政组织的效率低下，导致防疫反应虽然较为积极，但防疫措施的制定与落实却较为拖沓。

谭学华提出的防疫建议并未受到重视，直至11月8日，常德县政府才开会部署防疫工作⑥，制定了增加医疗力量、开展防疫宣传、预备捕鼠活动、建设隔离医院和等待国民政府疫苗等五项政策。会议将举办灭鼠竞赛的时间定于20多天后的11月30日，也根本没有提及极为关键的居民检疫措施。从这次会议结束到11月12日常德出现首例鼠疫死者的时间内，常德县城内的疫情处于缺乏监控的状态。汪正宇回忆道：“十一月十一日，有多人传说城内某地一带多有死鼠发现，和急症病人在起病后一二日内即行死亡！我们很想求得此等死鼠或患者来院查验，但死鼠终无人送来。”⑦谭学华写道：“在11月9日听说城内街道上常有老鼠出现（当时无人将老鼠送来检验），以上述法院街、青阳阁、关庙街等处为多。在11月10日到11日我们又听说城内发生有多人死于急症（发高热及瘀斑等，于1—2日死亡）。但未来我院诊治。”⑧可见，11月8日会议结束后，常德县城内的居民防疫检疫工作一直被漠视。或许已有居民因鼠疫传播而死亡，但是常德县政府与广德医院一无所知，直至11月12日常德鼠疫患者蔡桃儿被送至广德医院求诊，常德县政府才意识到鼠疫已经在本地暴发。

从时间上来看，11月8日距离日机空投细菌武器已经过去4天，距离谭学华检测结果上报已过去3天。在此期间，常德县政府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应对速度实属缓慢。⑨如前所述，谭学华在报告中抱怨“无人将老鼠送来检验”⑩，反映了当时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未高度重视此事。鼠疫跳蚤的传播严重

---

①《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

② 谭学华：《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1942年3月1日，67—1—333。

③ 中村明子：《中国发生的鼠疫同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王希亮译，《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6—7页。

④ 谭学华：《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1942年3月1日，67—1—333。

⑤《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

⑥ 常德县政府：《常德县防疫会议记录》，1941年11月8日，100—5—168，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⑦ 汪正宇：《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1942年12月，转引自邢祁、陈大雅主编：《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第70—73页。

⑧ 谭学华：《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常德市施放鼠疫细菌的滔天罪行的回忆》，1972年3月24日，372—2—16，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⑨ 常德县政府：《常德县防疫会议记录》，1941年11月8日，100—5—168。

⑩ 谭学华：《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常德市施放鼠疫细菌的滔天罪行的回忆》，1972年3月24日，372—2—16。

依赖老鼠的数量，在疫情尚未流行开来时若能积极捕杀老鼠，或可大幅度降低疫情的流行速度。但在常德防疫会议中将捕鼠活动安排至月末，未制定相应的居民检疫措施，这两点失误使得常德的鼠疫快速传播开来。

发现鼠疫已经暴发后，常德县政府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才开始积极防疫。11月12日首位鼠疫患者出现后，常德县政府立刻电告国内各方，请求医疗援助。最先响应的是驻扎常德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中队队长钱保康，他迅速命令下辖全体医护人员参与常德居民检疫工作。11月14日，国民政府第六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处长陈立楷会同德山驻军总司令部刘毓奇主任、军委会俄籍卫生顾问司威威巴克及肯德队长等人，共同商议防疫纲领，决定将救护总队第2中队的全部医疗力量集中于常德，并等待国民政府及其他地区医护人员支援。①

11月16日，常德县再次召开防疫会议，制定了应对鼠疫疫情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新的隔离医院以安置病人；组织以警察局局长、镇长、保甲长三级为依托的疫情情报收集制度，确保疫情不失控；明确救护总队第2中队为主要检疫工作人员等。会议结束后，救护总队第2中队便承担起常德防疫的主要职责。此时，第2中队下辖的5个分队已经全部启程，分别于17日、19日、29日到达常德，第2中队中队部则进驻大高山巷91号，指挥防疫。②之后，国民政府及各地援助常德的医疗人员陆续抵达。

常德防疫处的成立标志着常德防疫战逐渐走上正轨，国民政府逐渐接管了常德防疫工作。中央卫生署第2防疫大队大队长石茂年、湖南省卫生处副处长邓一韪、“常德鼠疫调查队”陈文贵，以及多支防疫力量于11月18日至27日相继抵达常德。③11月20日，常德召开防疫会议，正式成立常德防疫处④，积极推动常德防疫工作有效开展。

日军从1940年起分别在衢州、宁波散布鼠疫⑤，如今又在常德如法炮制，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1941年11月21日，蒋介石签署手令：“应特别注意研究常德等地鼠疫及毒气，组织常设机关，实地调查搜集证据，从速防治。”⑥1941年11月下旬，中央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先后出台《处置敌机掷下物品须知》《防制敌机散布鼠疫杆菌实施办法》《补充防制敌机散布鼠疫杆菌实施办法》等预防细菌武器袭击的文件。⑦为研究常德鼠疫流行情况，国民政府委派陈文贵于11月24日率领“常德鼠疫调查队”抵达常德。经过8天的细致调查工作，12月12日陈文贵完成《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又派遣伯力士于12月21日到达常德，进行实地调查并收集细菌战相关证据，伯力士于12月30日完成《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并上报中央卫生署。

一份份文件与报告可见国民政府对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重视，但在常德防疫措施的落实上仍存在不少遗憾。首先，在常德防疫组织架构中，防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虽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是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也应当承担实际责任，否则，容易相互推诿卸责。⑧其次，通过梳理《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陪都防制敌机散布毒气及病菌会议记录》《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四份报告⑨，可见常德防疫情报系统十分紊乱，不同信息来源报告的信息差异巨大，居民检疫与数据情报收集工作均出现严重失误。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常德鼠疫暴发的突然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内部政出多门，落实工作难以取得应有

---

① 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

② 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

③ 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

④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⑤ 金子順一「PXノ効果略算法」、NPO法人・731部隊細菌戦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anti731saikinsen.net、2025年6月3日。

⑥ 军政部军医署：《陪都防制敌机散布毒气及病菌会议记录》，1941年12月2日，472—106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1942年12月，372—703。

⑧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⑨ 陈文贵：《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372—2—16；军政部军医署：《陪都防制敌机散布毒气及病菌会议记录》，472—1062；伯力士：《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1941年12月30日，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钱保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41年12月2日，《救护总队档案》40—3—34。

的效果。最后，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未能充分发动群众防疫，一味依靠行政命令与军事干预，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导致防疫措施难以落实。更有甚者，在防疫工作中视人命如草芥，竟有直接火化未咽气患者①、不顾一切焚烧民居等行为。②如此暴力防疫只会激发民众的逆反心理，更加疑虑和抗拒防疫工作。

三、二次防疫的稳步推进

为进一步加强防疫治理，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21日委派伯力士担任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技术顾问。伯力士曾于1941年间赴衢县主持浙江细菌战防疫工作，在组织指导防疫过程中，他总结了四条防疫经验。首先，充分重视老鼠在疫情传播中的作用，做好监控鼠族和灭鼠工作是疫情防控的必要手段；其次，交通管控对于防制疫情扩散有重要作用，应在水陆重要交通节点设立关卡并审核通行；再次，完善疫情情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疫情漏报、瞒报，准确掌握疫情传播情况；最后，应积极宣传防疫知识，通过多种途径将防疫信息传达给民众。③伯力士将以上防控经验引入常德，有效提升了防疫效果。

伯力士在《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中指出，日机散布鼠疫菌除引发常德鼠疫流行外，还有可能造成常德地区鼠族间鼠疫流行，进而引发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他说："为了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关键问题做出决定，必须进一步延长时间，继续调查。"④伯力士着手建立了老鼠监测体系，预防第二波鼠疫疫情。在伯力士到达常德之前，暂无任何史料提及常德本地医疗力量进行过老鼠监测工作。⑤根据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的报告记录："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本年一月三日，检验老鼠三十五只，无疫鼠发现。本年一月三十日至卅一日，检验老鼠二十四头，染疫者五头。二月一日至十五日，检验老鼠五十四头，染疫者十三头。是知常德鼠疫业已染及鼠族矣。"⑥伯力士认为跳蚤会引发老鼠间鼠疫传播，因此监控老鼠的数量和感染情况很有必要。⑦当老鼠携带鼠疫杆菌的数量达到17%时，伯力士预判新的鼠疫即将暴发。⑧

伯力士的判断十分准确，随着老鼠染疫率的上升，鼠疫在常德重新暴发。3月20日开始，常德县城内陆续出现鼠疫病患，而该月老鼠染疫率达22.4%，与伯力士的判断不谋而合。3月20日，来自华严庵52号的小贩向玉新发病，3月24日去世；3月22日，来自关庙街湖南旅舍的陈孔昭发病，3月28日去世。进入4月，常德县城内鼠疫病患激增到19例，而老鼠染疫率则飙升至44.4%。⑨由于早有预测，在第二次鼠疫暴发前，常德县内各机构已在伯力士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鼠疫预防和救治工作。

国民政府各级部门应对常德第二次鼠疫工作相对稳健。在鼠疫暴发前夕，3月13日常德防疫处召开了第二次防疫会议。会议听取了伯力士关于鼠蚤检验的结果和针对鼠疫防疫的建议，讨论了关于检疫工作实施、居民防疫事项推进、病患家属安置、尸体处理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办法。这次会议针对防疫工作，制定了许多细致具体的落实方案。例如，在解决"应如何训练保甲长及协助之军警以利防疫工作案"这一问题时，提出"本城保、甲长须一律予以防疫训练四小时""军警训练由保安队及警察局各选士兵及警察各五十名，在各队局训练防疫要点四小时，水警队亦应派警参加"等解决办法，可见常德县政府在本次防疫工作前积极准备。⑩除制定详细条例外，国民政府还积极筹备人力物力。

---

① 朱清如：《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第27页。

② 常德防疫处：《常德防疫处三十一年度第三次会议记录》，1942年4月13日，100—3—171，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③ 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县细菌战史实》，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第64—149页。

④ 伯力士：《关于常德鼠疫——致金宝善的报告》，1941年12月30日，转引自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第214页。

⑤ 王诗恒：《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1942年7月20日，372—06—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⑥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三十一年三月上旬〈疫情旬报〉第一号》，1942年3月12日，476—19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⑦ 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第214页。

⑧ Phyllis Bannan Woodworth, *From Manchu to Mao: At Home in Hunan, 1909-1951*, pp. 316-317.

⑨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⑩ 常德防疫处：《常德防疫处三十一年度第二次会议记录》，1942年3月13日，100—3—171，常德市武陵区档案馆藏。

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常德获得了相对充足的医疗人才与物资。常德再度发生鼠疫疫情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湖南省卫生处、本地战区长官部均调集防疫队前往常德。①医疗物资方面，常德也可称之为“充裕”。在抗战时期全国医疗物资短缺的大背景下，常德备有“足供十七万人用量之鼠疫疫苗”，以及“足供六万病例”使用的鼠疫特效药磺苯胺噻唑，灭鼠灭蚤之化学药品“最近亦已由美国运到”。②为应对第二次鼠疫流行，常德从防疫队伍、人员到所需药品、器材等方面均做了相应准备。

在疫情防控中，及时掌握疫情数据，建立疫情情报体系是十分重要的防疫措施。如前所述，常德第一次鼠疫流行期间，疫情情报系统形同虚设。伯力士提出，要与其他医疗人员和乡村医生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及时获取病例信息，尤其是提早获知重症患者，及时治疗和控制病情，每位医护人员都应记录病人的详细信息，定期检查以发现疑似病例。③在浙江防疫期间，伯力士曾改善疫情报告制度，要求当地保、甲长等基层管理人员发现疑似病患时，立刻报告并送往医疗机构，接收病患的医疗机构在确诊病例后也应当立刻上报④，这一防疫经验在常德防疫战中得到运用。

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认为防疫犹如作战，疫情情报工作与军事情报工作一样重要，必须准确、严密且迅速，只有这样才能提前防治或迅速扑灭疫情。对患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一方面能够挽救患者的性命，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传染风险。为此，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期间，常德防疫处要求本地所有医院发现疑似鼠疫症状病人后，必须及时上报；警察、保长、甲长等基层管理人员应按时巡视辖区，检查有无发病人员，该项工作计入工作考核。⑤

常德县政府为了防止居民瞒报、漏报疫情，从医疗、丧葬两方面采取措施。由于医护人员接受过专业教育，对防疫措施的理解、配合程度高于普通民众，相比于要求患者自行上报，医护人员瞒报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医护人员要承担起报告疫情的责任，而严格清查死亡人口，既能避免居民无法辨别死因而漏报，也能集中处理尸体，避免疫情扩散。这样的疫情情报体系是科学而有效的，从3月20日常德第二次鼠疫流行开始，到4月底清查出患者22例，比第一次鼠疫流行两个月清查到的病患数还要多，可见疫情情报体系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清查病患的基础上，如何做到避免传染扩散，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大规模扑杀鼠类，可以有效切断鼠疫传播路径，进一步消灭鼠疫。在容启荣看来，如果完全消灭常德鼠类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鼠疫问题，然而以当时的社会力量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尽量减少鼠类数量，就可以减少鼠疫传染的机会。⑥伯力士出于监控疫情的考虑，开始大量捕杀老鼠，并进行解剖观察，从1941年11月24日到1942年7月20日，共检疫老鼠1879只。⑦检疫之外，为大量捕杀老鼠，“其最妥善之方法为利用氰酸气熏蒸法。该项药品一批已由美运到，正在疫区施用。至于以煤焦油及肥皂制成□□状灭蚤液，颇有成效，但采购大量煤焦油备用极为不易，现正试验改用其他灭蚤药品。”⑧

切断鼠疫传播路径一方面可以暂缓本地疫情暴发，另一方面作为交通枢纽城市的常德，若疫情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常德地处湘西北，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西通川渝，南至云贵。当疫情暴发，染疫蚤类、鼠族极易通过随商旅货转运至全国各地。至于鼠疫病患，如任其脱离疫区，不但难以保证其安全，更有引发外地鼠疫之风险，因此设置交通检疫十分必要。常德防疫处原本准备“在川湘、湘鄂、湘黔、湘桂等水陆交通要道设置检疫站，所有来自常德、桃源之旅客一律须受检查有无染疫症状，并将所有车辆船舶及所载货物予以消毒灭鼠及灭蚤。”⑨然而，实施如此规模的交通检疫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

①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②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③ 王诗恒：《常德鼠疫及其控制方案的报告》，1942年7月20日，372—06—16。
④ 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县细菌战史实》，第66页。
⑤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⑥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⑦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⑧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⑨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

战时中国难以承受。因此，湖南省卫生处提出简化措施，要求过境船只不停留，发现鼠疫船只和病患隔离七日，行人通行需检查身体并办理通行证等。①虽然只实施了简化的交通检疫，但是以当时国民政府之组织能力而言，已属不易，而且确实起到了阻碍疫情传播的作用。直到常德疫情结束，鼠疫并未大规模扩散至常德以外地区。

经过较为科学的防疫工作，常德第二次鼠疫到1942年12月3日基本结束，城区内再无新增病例。②鼠疫并非中国常见之传染病，医疗人员对鼠疫的认识本就不足，有防治经验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自日军在浙江散布鼠疫菌后，方引发国民政府卫生署之注意，并在浙江衢州设立防治鼠疫人员见习班，且交由伯力士指导。伯力士调任常德后，继续在常德开办防治鼠疫人员见习班，培养防治鼠疫专业人才十余人，并将其分派到全国。③常德的战时防疫工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本地疫情，而且为国民政府的卫生工作积累了防疫经验。

全民族抗战时期常德的两次鼠疫防治成效明显不同。首先，从防疫准备工作来看，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暴发之前，伯力士团队积极开展老鼠监测工作，有效预测了鼠疫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积极筹备各类医疗资源和防疫力量，为有效防控第二次鼠疫奠定了基础。其次，从防疫工作安排来看，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期间，常德县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尽力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基层医疗单位和社会基层管理组织中，尽可能将防疫活动覆盖到常德城区所有居民。最后，伯力士在制定防疫措施时，充分借鉴浙江防疫战中的经验教训，在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下，制定了科学且符合常德本地情况的防疫措施并积极推广。

纵观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疫活动，虽有不少无奈、遗憾，甚至错误、过激的举措，但就常德细菌战防治而言，其防疫成效可圈可点。常德细菌战防疫汲取了浙江细菌战防治的经验教训，也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样本与范例。常德防疫战期间，经过陈文贵、伯力士等专业医师的不懈努力，最终证实了常德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为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并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反人道罪行。常德防疫战虽然是国民政府的被动应对，但是经过各方努力，疫情被限制在常德县区及周边村镇，并未造成大规模疫情外泄，这不仅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有效缓解了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严峻压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原本为缓解人类疾病痛苦、救死扶伤的医学研究成果，运用于侵略战争，犯下反人道罪行，严重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宗旨，结果只能是失败，且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外防疫工作者不仅在科学防治中扑灭了常德鼠疫，而且奔赴浙江、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开展战时鼠疫防治，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常德细菌战防治，以史实揭批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派学者否认战时日本实施细菌战的谎言，提示我们只有坚持正确的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传递正确历史记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才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构建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责任编辑：许丽梅）

---

① 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德桃源鼠疫工作报告》，1943年4月，73—3—6（2），湖南省档案馆藏。

②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第三十八号》，1942年12月21日，149—2，中央档案馆藏。

③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1942年9月，74—3—6。